

孺子牛文丛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著

B-49



华龄出版社

综合哲学随笔

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哲学思考

高亮之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欣雨

装帧设计:三星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综合哲学随笔/高亮之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5. 6

(孺子牛文丛/林风主编)

ISBN 7-80178-231-3

I. 综... II. 高... III. ①自然科学—文论②社会科学—
文论 IV. ①N61②C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708 号

书 名:综合哲学随笔

作 者:高亮之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5

字 数:16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18.5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传 真:**84039173

序(一):勇于创新 敢于突破

章世鸿

老战友高亮之同志的哲学著作《综合哲学随笔》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是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却同时对哲学发生兴趣,孜孜以求,看了古今中外许多哲学书,写了许多笔记,并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对于哲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敢于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坦率地说,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要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要有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

我们都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因而我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起。

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反对一切停滞不前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应该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其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任何学说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应该是一门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科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在中国的演变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即二十世纪初,那时马克思主义刚进入中国,显得虎虎有生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它当然是站在理论创新的前哨。那时候,拥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越来越多。

但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复杂了。主要责任在斯大林。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不但苏联党内、国内都听他的,其他各国的党也跟着他走,把他看作活着的列宁。但斯大林掌握政权后,完全丢掉民主与法制,搞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就被他的权力所垄断。斯大林一人掌握了“绝对真理”,其他人只能随声附和。凡有不同意见的,都成了异端,被关被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不再具有创新精神,理论家的工作只剩下歌颂领袖如何英明。那时候,如果有一种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理论略有出入,那就会受到严重打击,置你于死地。这段历史相当长。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图书市场充塞许多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译本,还有苏联的著名哲学家来华讲学。当时把苏联的一切视为学习榜样。这些东西,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但流毒尚未肃清。

第三阶段则以邓小平同志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为标志。邓小平的理论确确实实是一种创新理论,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某些社会主义传统理论作出了否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轨道上来,使传统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在危急时刻挽救了马克思主义,挽救了社会主义。

这三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说,斯大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本质,那么,邓小平理论又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的理论和苏联失败的模式,重新回到健康的轨

道上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应该跳出老的框架，与时俱进。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曾遭到严重歪曲，因而，首先要恢复它的真面目，澄清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长期垄断哲学界的错误观点。

比如，将辩证法中的对立同一规律，抽去事物内部的同一性或统一性，而把对立斗争绝对化，引申出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不断地挑起社会人群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把这种理论引入党内，展开极为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理论和实践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歪曲，导致人性的堕落，兽道主义盛行。

又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但1979年我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当有人在报刊上重新提出这个命题时，理论界有的人如发现新大陆似的兴高采烈；有的人则十分惶恐，不敢表态；有的人则公然反对，说这样提是反对毛泽东，是“砍旗”。中国在哲学理论上的大混乱和大反复，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再如，过去对世界哲学史的理解，完全照抄苏联的教程，简单化又粗暴化。即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简单地分为两大类：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给每个哲学家贴上标签，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最后则是统统加以否定，其原因无非是阶级立场问题。而且哲学界似乎永远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一公式化的刻板的图象，看不到各派各有所见极为丰富的内容，看不到不同的认识是怎样互相激荡、互相推移，最后融合为一种更加全面的真理性认识。

哲学家熊十力有句名言：“哲学上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是哲学所以没有进步的一大原因。”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建国后一段漫长岁月，中国哲学很少有建树。其原因是：如五十年代批判

胡适哲学，六十年代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八十年代批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由于背离实事求是精神，带来的是思想混乱。

上面这些问题，在高亮之同志这本著作中从不同视角都有所阐述。综合哲学的理论显然是在总结中国当代理论的痛苦的经历的基础上提出的，其锋芒显然是针对斗争哲学的。他的结论是：

“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斗争，但主要是互相协调，互相综合。”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新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看，凡是坚持合或综合的方针，国家就得到发展，凡是执行分或对立的方针，国家就会遭到损伤。”

高亮之同志运用综合哲学分析历史，也否定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主要动力的理论。他在分析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发展过程后说：“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看，不能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应当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因素的进步。”中国的现状也证明了这一点，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而这恰恰是在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之后。

高亮之同志是从事农业科学的科学工作者，综合哲学也是他一生的丰富的农业科学实践的结晶和总结。它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不是凭空的构思。这些，恰巧是专业的哲学家所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许多新鲜的哲学思想往往是由科学家提出的，而不是专业的哲学家提出的。

以上这些，是我阅读高亮之同志这本哲学著作时的一些感受，目的是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这本著作的研究兴趣，以便共同来开拓新的理论视野。

2005年元月

章世鸿同志,祖籍宁波,1927年生,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在皖西解放区任《皖西日报》编辑。1949年,随部队进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接管工作。后任《新华日报》编辑。1953年调《人民日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长期担任《人民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1986年被评为高级记者。1994年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九十年代中国纪事》、《二十世纪反思》、《视野与思考——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等著作。

序(二)

吴大信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它的深入探讨、科学阐述、不断发展与创新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对国家、社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发展也必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高亮之同志的《综合哲学随笔》一书,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点。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有生命力。《综合哲学随笔》一书,力求密切联系我国的实际、当今世界的实际进行探讨,因而生动活泼,具有时代气息,这也是该书十分可贵的一点。

高亮之同志是我在浙大时的同学,我们虽然不同系、不同年级,但同为浙大地下党的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在解放战争时期,共同进行英勇的地下斗争,建立起可贵的战友情谊。就我所知,亮之青少年时期,就有强烈的求知欲,在学习上认真严谨,孜孜不倦,在高中三年的学习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进大学后,他一边参加地下斗争,一边勤奋学习,学习上丝毫没有放松。因而解放后不久,他就归队,重新深入地对自然科学进行探讨和研究。他在几十年来一直钻研自然科学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关注着我国的发展和国际上的重大变化。他结合作,曾到过十几个国家,并以此和我国进行对比和研究,掌握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因而离休后在大量阅读国内外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综合哲学随笔》一书。这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值得一看。哲学在党校是首要的打基础的课程,因此作为

一名党校工作者,我向大家推荐此书,并为之作序如上。

2005年1月22日

吴大信同志,1924年生,在建国前曾任浙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建国后曾任徐州市共青团团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副局长、市党校副校长。

序(三)

沈效良

不久前,我收到了浙江大学地下党的老战友高亮之同志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当即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关于哲学的小书”。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谈点感想和认识。几十年来,我一直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和宣传者。但是,惭愧得很,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外,其他的哲学著作学得很少,甚至没有涉猎过。在哲学素质上,远远赶不上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亮之同志。他看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哲学名著,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融会贯通了。正是凭借这个基础,他结合自己科学工作实践和亲身经历的许多历史演变,进行了认真的哲学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当完整、相当系统的综合哲学观点。

在这本书中,他对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里,仅就几个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一是本体论问题。他把人所面对的世界分为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而不是像过去笼统地讲“客观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他认为,对自然世界来说,其本原是物质;对人为世界来说,其本原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这样划分,对探讨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很有启发的。

二是对辩证法的评价。过去我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几对主要范畴是深信不疑的,认为这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书中

认为,辩证法对人们关于世界事物的思考,虽有一定帮助与启发,但不能把它看成是宇宙与世界事物的普遍规律,更不能将它的几条法则任意套用在任何事物之上。他认为,事物有的可以一分为二,有的也可以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斗争,但主要是互相协调和互相综合;事物的变化一般都是渐进的,变化速度有快有慢,并不一定经历量变、质变两个阶段,等等。支持这些论点的论据,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是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按照唯物史观,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而在这两对矛盾中,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着主要的和决定的作用,它们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本书在肯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历史发展是科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具体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三者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依次是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直接性的决定作用和先导性的决定作用)。这样具体分析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是非常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或说主要、直接、甚至唯一)动力。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结论是: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来看,不能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应当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因素的进步,这就从哲学的高度弄清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错误。

五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并

且认为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亮之同志从人类的本质特性出发,认为人类会向不断完善的真、善、美、爱的综合目标前进,这些目标也可以认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但是,我们无法预知这些目标何时能够实现,以及通过怎样的渠道实现。这些观点,对于探讨历史发展的目标,是很有启发的。

2004 年 12 月 10 日

沈效良同志,1929 年生,建国前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员,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某师副政委。

自序

这本小书在2004年3月出过初稿,只印了一百本,分别寄送我在1946-1948年间浙江大学地下党的战友们与1948年共赴大别山解放区的战友们。

在寄给战友们这本书的同时,我也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以下几段话。现引用在这里,以说明我写作这本书的本意。

朋友们:说来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我们对于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幸福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

我们都为革命的胜利与国家的进步而高兴。我们也都对国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严重挫伤而痛心、而疑惑。

无庸讳言,不论是苏联共产党,或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成功的同时,都有过重大的失误。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肃反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中国1957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伤害或残害了无数优秀的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斗争的干扰,以及僵硬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使得苏联与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国家,并终于导致1991年苏联的解体。

当然,苏联与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是由于领导人在路线与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同时,不能不说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够完善,以及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的偏差也有关系。马克思本人无疑是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他的学说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博得人们的赞誉(当然也有批评)。但是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距今已

经有一百多年。马克思毕竟不是神,不能要求他的著作中的所有论点都完全正确无误,更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到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科学与经济的巨大进步),而使他的论点完全适用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与命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哲学的精髓。

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完全符合历史与当代客观实际的论点。其中,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论点、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的论点,关于否定商品经济的论点等等,对于中国,负面的影响甚大,而至今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全澄清。

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批评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出:“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是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可惜他本人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的态度。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方针,是对于中国的重大贡献。他在经济建设上大胆地从马克思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中解脱出来,使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观点,其基础还是在哲学观点。由于以上的考虑,并为了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我将几十年来阅读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时反复思考、逐渐积累的心得体会写成了这本小书。我并不敢认为自己的观点一定完

全正确,我只是希望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一些思考,在理论上探讨一些问题,以有助于国家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以上就是我给朋友们的信中的话,表明了我写这本书的最初的考虑。

2004年5月28日,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中学习会议上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我写这本小书,就是在响应上述要求的主观愿望下,作出的一份努力与一个探索。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得到全国上下热烈响应。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也就是本书所讲的综合哲学的理念。希望本书对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哲学思想的依据。

我愿意在自序中再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产生的过程与正式出版前得到的反应。

这本小书的初稿寄出后,我很快收到许多老战友们的来电与来信。他(她)们对于我写作这本书的精神给予热情鼓励,有的表示赞同书中提出的观点,有的在文字上认真地帮助作了校正,有的在内容上提出一些修正的建议。在同志们帮助的基础上,我作了一番全面的修改,又印出了此书的二版,共两百本,仍然是内部交流,分送更多的朋友。

当年同赴大别山的在南京的老战友们,特地举行了一次座

谈会讨论此书。会上赵志同志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本书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理论探索，符合十六大‘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新境界’的精神。”强国瑞同志提到《中庸》中的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认为可以作为综合思想的依据。（我在本书中接受了他这个很好的建议。）有一位同志说：“我收到此书时，正在病中。读了此书，使我精神振奋，似乎身体也好了一些。”他这番朴实的发言，真的使我很受感动。

浙大地下党的战友吴淦同志来信说：“我完全同意你在第十章中运用综合哲学思想，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中一些重要问题作出的分析。……我也同意后记中所述的，在哲学思想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部分综合起来，将西方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中的合理部分综合起来，……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的观点。”

战友们对于此书的积极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写得有多好，我只是体会到书中所反映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确实是我年龄与经历相似的老同志们，也包括有理论兴趣的中青年朋友们所共同关心的。

不少朋友建议我将这本书正式出版。我在大家的鼓励下与若干出版社作了联系。由于书中毕竟涉及一些理论上的敏感问题，我原来担心出版社可能不愿意出版。后来，南京与北京各有一家出版社请人审阅后，认为此书写得有深度、有新意，愿意出版。我由此也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理论与学术领域中确实已经比较宽松，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相比，已经有很大进步。（这本书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出版的，并且作者必然会遭受祸害。）学术自由与思想宽松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也对于中国的前途增强了信心。